

海南解放之后不久,在广州至海口的海上航线上,多了一家轮船公司的班轮。这家公司的客货轮以服务优良、设备先进而获得海南旅客的一致好评。这就是著名的民生实业公司在解放后唯一新开辟的沿海航线——琼穗线上的客货轮。

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(1893–1952),重庆合川人,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实业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。他在 1925 年怀抱“实业救国”之志,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,开展长江航运,到 1949 年已拥有 148 艘江海轮船,投资 60 多个企事业项目,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之一。

1949 年 10 月 1 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,其时卢作孚正在香港处理民生公司海外业务,被阻隔在香港无法回归。民生公司当时也有 20 艘海轮被迫滞留在香港。卢作孚先生不顾个人安危,于 1950 年夏秘密返回祖国大陆,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 1950 年 6 月在北京开幕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：船王卢作孚秘密回归祖国大陆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清秋子

不为国民党大员的劝诱所动

1949 年下半年卢作孚先生在香港期间,与中共驻港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,经常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会面。会面的地点,就在停泊于港内的“虎门”、“石门”轮上。两人往往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,所谈的内容非常广泛,除了民生公司的前途之外,还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、中共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主张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等问题。

张铁生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,早年曾翻译过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和康德的《实践理性批判》,还曾写过一系列介绍康德哲学的文章。

张铁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,为人寡言。会谈时,常常是卢作孚讲话较多,谈了很多他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见解,深获张铁生的赞赏。

在不断的会谈中,卢作孚加深了对中共当前政策的了解,并与张铁生商定了如何将滞港船只驶回大陆的大致计划。卢作孚与中共人士的这种密切接触,在民生公司中只有极少数高层人员知悉,其他人并不知道情况。

民主人士胡子昂在离开香港赴北京前,曾来看望过卢作孚,约卢作孚一同回大陆。卢作孚因计划不宜过早透露,只对胡子昂说,迟早是要回去的。

卢作孚居港期间,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也纷纷出动,劝说卢作孚前往台湾。有一次张群来香港,就曾劝说:“作孚呀,到台湾去看看吧。”

张群虽是卢作孚的多年老友,但毕竟是国民党的要员,卢作孚的心思不便向他明说,只能婉言谢绝:“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,需要处理,走不开。”

身处险境决不放弃民生公司事业

1950 年春,台湾方面的“外交部长”叶公超因事来港,几次与卢作孚见面,以民生的加拿大借款担保问题为胁迫、以张群、陈诚的名义为劝诱,企图说动卢作孚赴台,但被卢作孚拒绝。

其后,台湾方面即将上任的“行政院长”俞鸿钧,以及“财政部长”严家淦、台湾“省财政厅厅长”任显群,也曾先后赴港劝说卢作孚前往台湾并封官许愿,均被卢作孚婉言谢绝。

卢作孚当年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、原“青年党”委员长左舜生,此时正在香港新亚书院任教,曾用了半天时间与卢作孚晤谈,力劝卢作孚不要去大陆。过去在四川共过事的刘航琛,此时也在香港。他也力劝卢作孚不要回大陆,说是中共方面公布的 100 多名战犯名单里,恐怕就有卢兄你在里头,还是去台湾为好。

卢作孚表示,台湾,绝对不会去!

他开始考虑,应尽快将停泊在香港的轮船全部开往上海。这批轮船如果长时间滞留香港,前途莫测,但是事情也有另一面,轮船驶回上海,就要通过国民党军事力量控制的台湾海峡,风险极大。如何解脱这个两难处境,卢作孚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

当时,国民党势力退守台湾、海南和东南沿海的几个岛屿,朝不保夕。为保住残存的这一点基础,国民党特工人员在香港十分活跃。香港的处境,对卢作孚来说已相当危险。

这期间,好友晏阳初曾劝卢作孚去美国暂避一时。晏阳初认为美国比香港安静,卢作孚可以在那儿写自传或事业发展史,由晏阳初负责组织翻译出版。

卢作孚没有答应。事后他曾就此事谈了他的看法:“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,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,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,怎能丢下就走。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,我什么也不怕。”

为了民生事业,他只能赴汤蹈火!

回归计划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安排

这一次卢作孚在香港的滞留,到 1950 年的 6 月初,共有半年多时间。在这半年多里,他临危不乱、沉着应对,逐渐处理好了香港民生公司所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。也是在这半年多时间里,他与中共方面达成完全默契,回归只是个时日问题。

1950 年 3 月 24 日,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驻北京代表何陋仁,向周恩来第一次提出“公私合营”的建议。这是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个新概念。在卢作孚的构想中,“公私合营”是政府投资民生公司作为公股,帮助民生渡过难关,公股代表只参加公司董事会,并不直接参加具体的经营运作。



1945 年 5 月,卢作孚赴美归来在北碚留影。



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,卢作孚的事业就是从这条小轮船起步的。



重庆合川肖家场,卢作孚先生的故里。

就在这年春天,何陋仁衔周恩来总理之命,两次专程到香港,与卢作孚沟通离港赴京事宜。中共中央建议,卢先生可于 6 月中旬回到北京,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。

这一消息,使卢作孚大为振奋,同意在 6 月中旬离港北上。他随即召集香港民生公司高级职员开会,拟定了滞港轮船北归的详细方案。为了实施这个方案,卢作孚特地将原定的北归日期向后推延了一段时间。

为切实保证卢作孚的人身安全,卢作孚北归的一切准备工作,都由中共驻港组织负责人张铁生秘密安排。北归方案确定后,卢作孚在香港的工作与生活,一切如常,外人看不出有任何变化。

5 月下旬的一天,长子卢国维一家,由启德机场附近迁到了九龙柯士甸路,在柯士甸公寓租住了一套房住下,次女卢国仪也随同他们一道迁来。两天之后,卢国维和卢国仪前往新宁招待所,将卢作孚接到了公寓的住处住下。外界只道是卢作孚旧病复发,暂时住在儿子家调养。

此前在香港,曾发生过国民党特工暗杀民主人士的事件,因此卢作孚此行的保密工作十分周全。事前只有卢作孚好友何北衡、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和准备和卢作孚一起回归大陆的原“国民政府”四川省建设厅主任秘书谢明霄等少数几人,知道卢作孚即将离开香港的计划。

他最后的临时住所柯士甸公寓,是一个非常僻静的所在,公寓为五层楼,卢作孚住在第三层。这里除杨成质来过之外,民生公司的其他人都不曾来过。

秘密北上一路接应严密

带有几分惊险色彩的北归计划,终于开始实施。1950 年 6 月 10 日,卢作孚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,离开香港。

当天早晨还不到 7 点钟,香港民生公司的一辆潘蒂亚克牌小轿车就开到公寓门前,悄无声息地停下,从车上走下来谢明霄。

卢作孚、卢国维、卢国仪和服务员林文裕在柯士甸公寓早已做好出发准备,轿车一到,就立刻上车。谢明霄随后也上了车,车上除司机外的 5 个人中,除卢国维是去送行外,其余的人都将随同卢作孚一起赴北京。

轿车在晨光中穿过尚且安静的九龙市区,进入新界农村,疾驶在公路上。路两旁是大片的田野,早稻已黄,菜叶青青。卢作孚不时探出头去,眺望着令人心身舒畅的田园风光。看了许久,他回过头来,对车内的人说:这里虽然不错,但终究比不上富饶的江南和成都平原。接着,又无不遗憾地说:想不到在香港的农村也看不到一辆拖拉机。

沥青路面的公路到了尽头,汽车开上了山坡上的碎石路,盘旋的路渐渐升高,从车里就可以俯瞰新界的辽阔野碧,卢作孚凝望着那片土地,自语道:“甚至香港和九龙半岛,都将不成问题了。”

车行至一片茂密的树林前,来到了一个岔路口,靠右边的那条公路上停着一辆带篷的大卡车。这辆车,就是中共驻港组织事先安排好来接应卢作孚过境的。

卡车司机和一位中国旅行社的工作人员,面带微笑迎上来,向卢作孚热情问好。之后,将行李装在了卡车上。

卡车的车厢里,预先摆放了椅子。卡车司机和工作人员将卢作孚、谢明霄扶上卡车,安排坐下。卢国仪和服务员林文裕随后也登上了卡车。前来送行的卢国维到此止步返回九龙。

卡车启动,沿公路继续向前行,不久在半途停下来,一行人又换乘早已等候在路边的两辆轿车,继续朝北疾行。当天上午,就顺利通过边境,抵达广东省的边境小镇——深圳。

深圳所在的宝安县人民政府早有安排,当天下午就将卢作孚一行送上火车,前往广州。在广州火车站,卢作孚受到了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的欢迎。由于全国政协召开在即,卢作孚在广州仅住了一夜,第二天就匆匆乘火车北上。

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夕,卢作孚如期抵达北京。为避免民生公司留在香港的船只遭国民党特工报复性破坏,卢作孚本人提出请求,经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,卢作孚抵京的消息并未在广播电台和报纸上透露。

抵达北京时,卢作孚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人士和一些老朋友的欢迎。

6 月 15 日,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,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。